

庄廷江 著

“战时新闻学” 研究

(1936 — 1945)

01403622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G219.296

13

“战时新闻学” 研究

(1936 — 1945)

庄廷江 著



G219.296

13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33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时新闻学”研究(1936—1945)/庄廷江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2

ISBN 978-7-216-07960-0

I. 战… II. 庄… III. 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1936~1945 IV.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1505 号

出 品 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文史古籍分社

责任编辑:邓 涛

封面设计:汪 汉

责任校对:游润华

责任印制:王铁兵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219 千字

版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7960-0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张:14

插页:2

印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时代转向：“战时新闻学”的兴起	(5)
第一节 “战时新闻学”兴起的背景	(5)
一、民族危机催生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焦虑	(6)
二、思想界学术界吹响民族救亡的主旋律	(8)
三、学术研究转向“经世致用”	(11)
第二节 “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起	(13)
一、新闻学研究重心转向“新闻救国”	(13)
二、“战时新闻学”的正式提出	(22)
第三节 “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盛	(24)
一、“战时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团体	(24)
二、“战时新闻学”的主要研究期刊	(28)
三、“战时新闻学”的主要研究著作	(32)
第四节 “战时新闻学”研究者及其群体特征	(34)
一、“战时新闻学”主要研究者概况及群体特征	(35)
二、战时新闻学者代表人物简介	(39)
第五节 “战时新闻学”的研究特征及其思想渊源	(43)
一、“战时新闻学”的研究特征	(44)
二、“战时新闻学”的思想渊源	(46)

第二章 建立抗战“文器”：“战时新闻学”的业务观	(56)
第一节 战时新闻报道原则	(56)
第二节 战时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61)
一、战争报道夸大战绩	(61)
二、新闻报道公式化	(63)
三、新闻报道中存在败北主义倾向	(65)
四、指导性新闻报道缺乏	(66)
五、战地新闻要素残缺不全	(67)
六、缺乏典型报道	(68)
七、战时新闻报道单一化	(69)
第三节 战时新闻采访与写作思想	(70)
一、战时新闻采访思想	(71)
二、战时新闻写作思想	(73)
第四节 战时新闻编辑与评论思想	(82)
一、战时新闻编辑思想	(82)
二、战时新闻评论思想	(89)
第五节 “战时新闻学”业务观的思想渊源	(92)
第三章 “没有硝烟的战场”：“战时新闻学”的战时宣传观	(95)
第一节 战时宣传的重要性	(95)
一、宣传战线是总体战时代的三大战线之一	(96)
二、战时宣传是维系己方民心士气对敌攻心夺志的重要利器	(98)
三、宣传战与火药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99)
第二节 战时宣传的目的与原则	(101)
一、战时宣传的目的	(101)
二、战时宣传的原则	(103)
第三节 强化战时宣传的方法	(107)
一、抗战初期宣传工作任务的确立	(107)
二、抗战初期宣传工作的不足	(109)
三、如何加强战时宣传工作	(111)

第四章 “合理的统制”：“战时新闻学”的新闻自由观·····	(123)
第一节 战时新闻自由观的思想内核·····	(123)
一、战时应该限制新闻自由·····	(123)
二、战时新闻学者接受新闻统制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	(126)
第二节 关于战时新闻自由边界的探讨·····	(134)
一、探讨战时新闻自由边界问题的动因·····	(134)
二、战时新闻自由边界的探讨·····	(136)
第三节 基于新闻自由思想的战时新闻政策设计·····	(139)
一、范长江的战时新闻政策方案·····	(139)
二、国民参政会通过的战时新闻政策方案·····	(141)
第四节 战时新闻学者对国民党新闻统制的批评·····	(143)
一、新闻统制不应该以“消极的限制”为主·····	(144)
二、新闻检查不应妨碍言论自由·····	(147)
三、应该怎样实施战时新闻检查·····	(152)
第五节 小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	(156)
第五章 抗战宣传“急先锋”：“战时新闻学”的新闻记者观·····	(160)
第一节 战时新闻记者的使命和任务·····	(160)
一、战事消息的报道·····	(161)
二、打造前线和后方联系的纽带·····	(161)
三、强烈地鼓励人民的同仇敌忾的抗敌情绪·····	(162)
四、批驳揭发包括汉奸理论在内的一切荒谬言论·····	(162)
五、积极扶持人民的抗敌救亡运动·····	(163)
六、加强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宣传·····	(163)
第二节 战时一般新闻记者应有的修养·····	(164)
一、战时新闻记者要注重“人格”修养·····	(165)
二、战时新闻记者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	(168)
三、战时新闻记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政治修养·····	(170)
四、战时新闻记者要有无畏的精神·····	(172)
五、战时新闻记者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提高自己的技能·····	(174)

4 “战时新闻学”研究(1936—1945)

第三节 战地记者的个人素质和职业素质	(176)
一、战地记者的工作生存环境	(176)
二、战地记者的素质要求	(179)
第六章 “战时新闻学”的影响	(188)
第一节 “战时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影响	(188)
一、“战时新闻学”改变了抗战前新闻学研究的治学宗旨	(188)
二、“战时新闻学”开启了抗战胜利后大众新闻学研究的先声	(190)
第二节 “战时新闻学”对新闻业界的影响	(192)
一、“战时新闻学”研究促进了新闻宣传中问题的解决和新闻业务的 进步	(192)
二、“战时新闻学”研究改变了新闻业界的新闻自由观念	(193)
第三节 “战时新闻学”对国民党政府新闻政策的影响	(195)
一、战时新闻学者呼吁国民党制定战时新闻政策	(195)
二、战时新闻学者为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 学理论证	(197)
结语	(200)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16)

绪 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带给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极为巨大深远,而且这种影响是直接和明显的。就刚刚诞生不久的新闻学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新闻学研究偏离了原有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轨道,“战时新闻学”蓬勃兴起。

所谓“战时新闻学”,其核心理念就是:在全民同仇敌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新闻传播者应该共赴国难,为捍卫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新闻如同前线战士手中的钢枪一样就是新闻工作者手中的武器,新闻传播者应该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冲锋陷阵”。在这一新闻学研究理念下,“战时新闻学”的研究队伍日渐庞大,研究成果蔚为壮观。在全国以“战时”命名的新闻同业组织或以“战时”自励的新闻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如 1939 年成立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等。其他的一些战时新闻学术团体组织,如 1938 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9 年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成立的四川大学新闻学会、1941 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新闻学会等也都是以抗战作为本学会本团体的神圣使命和不可推卸的固有职责。这些新闻团体在新闻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一般都创办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讲习班、举行学术讨论会、出版新闻学著作等。他们创办的学术刊物主要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创办出版的《新闻记者》月刊,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出版的《战时记者》,山西省新闻记者协会主编的《战地记者》,中国新闻学会创办的《中国新闻学会年刊》,国立四川大学新闻学会出版的《新闻学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研究会发行的《新闻学季刊》等。

除学术期刊外,“战时新闻学”研究者还出版了大量的“战时新闻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7 年到 1945 年所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近 70 种,其中关于抗

战新闻学、宣传学的约有 25 种^①,占到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重要的如: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赵占元的《国防新闻事业之统制》,张友鸾的《战时新闻纸》,郭沫若的《战时宣传工作》,赵超构的《战时各国宣传方策》,陈原的《抗战与国际宣传》,沈颂芳的《国际宣传知识》,彭乐善的《广播战》,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编的《战时新闻工作入门》等。其他新闻学研究著作中也有很多章节是涉及战时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

“战时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战时新闻理论与业务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战时宣传理论与技术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关于战时新闻统制与新闻自由的研究。这三大板块研究共同撑起了“战时新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战时新闻宣传理论体系。环顾全球,战火硝烟并没有远去,战时新闻传播仍是一门“显学”。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梳理研究“战时新闻学”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时新闻学”的兴起与整个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语境是息息相关的。正如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一页,“战时新闻学”应该是中国新闻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

学术史是对学科发展的反思和总结,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任何一门学科不仅需要致力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研究,而且也需要研究自己。这是任何一门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共同走过的发展路径。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已有经年。如果以学界公认的 1918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那么到今天已经有九十余年的历史了。九十余年的新闻学研究和积累,奠定了今天的新闻学和新闻学研究体系。回望九十余年的新闻学研究,我们需要反思和总结。因此建立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性的新闻学术史,对今天新闻学科的健康发展,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当前新闻学界部分研究学者呼吁加强我国的新闻学术史研究。然而“学术史研究向为高人涉足的领域”^②,开展新闻学术史研究并非易事,它需要对整个历史上每一个阶段的新闻学研究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清理。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30 页。

② 李彬:《承前方启后,继往始开来——试论开展新闻学术史的研究》,《新闻大学》1997 年夏季号。

在当前的学术界,党报宣传话语支配下的新闻学研究以及由此带来的关于新闻学术史“革命史叙事”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抗战时期新闻学界的全部概貌。辉煌一时的“战时新闻学”往往被划为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部分,这使得“战时新闻学”逐步淡出了部分新闻学术史研究者的视野而被历史尘封。有的新闻学者虽然曾给予“战时新闻学”一定的学术观照,然而由于他们关于“战时新闻学”的第一手史料挖掘不够,因而无法走向历史的纵深,看不清“战时新闻学”的全貌。在这种状况下编写的新闻学术史或具有学术史意义的著作,不仅遮蔽了“战时新闻学”,而且误读了“战时新闻学”。在他们的论述中“战时新闻学”自然得不到其在新闻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张少康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史序》中曾直言:“我们感到现有的学术史编写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和不良风气。有些学术史著作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全,自己又缺乏对本门学科的研究,对整个研究的状况非常生疏,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所以评述不得要领,往往以偏概全,该讲的没有讲,该重点讲的没有重点讲,不该讲的反而讲得很多,实际上起到了某种误导作用。”^①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文学学术史研究而言,但对当前的新闻学术史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战时新闻学”研究盛极一时,从它的指导思想、论述领域、学者队伍、研究著作等方面看,它确实是抗战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更是近现代新闻学研究之链上的重要一环,在新闻学术史上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而只有深入的研究这段学术史,才能找准它的地位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由此看来,深入研究“战时新闻学”对于建构一部客观公正的中国新闻学术史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战时新闻学”这一概念是由新闻学者任毕明在其1938年出版的《战时新闻学》一书中明确提出,笔者借用这一概念作为论文的题目。但是笔者使用“战时新闻学”这一概念与任毕明专著中的“战时新闻学”有所区别。任毕明在其专著中认为“战时新闻学是反抗侵略压迫而斗争的战争的工具”,而笔者论文中的“战时新闻学”不仅包含任毕明赋予的含义,而且还有着其他特定

^① 转引自吴光正、曹金钟:《学术史首先是学术史史料的历史》,《学术交流》2004年第1期。

的含义。笔者使用的“战时新闻学”首先是一个具有时间属性的概念,突出强调“战时”。而“战时”又与所谓的抗战时期(1937—1945)有所区别,笔者所谓的“战时”主要是针对新闻学研究内容的属性而言。由于国难危机的加深,在1936年部分新闻学者就已经开始重视新闻抗战研究,此为“战时新闻学”的兴起。因此,在时间维度上,“战时新闻学”特指1936年到1945年间的新闻抗战研究。其次笔者使用的“战时新闻学”还具有一定的派别群体的意义。这一群体成员是比较庞杂的,以身份论,既有媒体从业者也有学界专家学者;就个人政治背景而言,既有党派背景者也有无党派背景者。从学术体制看,这些研究人员,既有体制内的研究者,如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等;也有体制外的研究者,如众多的新闻一线从业人员和其他学科人员等。最后,从研究成果形式来看,“战时新闻学”成果形式是多样的,有笔记漫谈,有个人经验总结,有严肃的学术论文,还有如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那样的学术专著。

第一章 时代转向：“战时新闻学”的兴起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的蚕食渗透和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使得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变得格外令人关注担忧。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人的民族危机感进一步加剧。思想界知识界纷纷从自身出发,开始追问探寻挽救民族危亡之道。站在国家民族这艘巨轮船头担当“环境监测”重任的新闻界,对民族危机感受最为直接最为深切。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大业中,新闻界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新闻媒体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成为新闻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和追问的话题。由此形成了近代以来新闻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支——“战时新闻学”。

第一节 “战时新闻学”兴起的背景

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的开篇即言:“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①其意在说明学术思潮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兴起必然是缘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言论,他曾说“学术随时代为转移,新时代之降临,常有一种新学术为之领导或推进”^②。两位大师的言论告诉我们,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任何学术问题都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更是一个与时代脉搏声气相通的社会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② 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7 页。

现实问题。学术问题之所以具有复杂性和深刻性的特点,至少部分是来源于学术与社会现实纷繁复杂的关系。因此,学术与现实产生种种的勾连,是任何学者所无法规避的。学术研究如果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则必然会沦为从范畴到范畴从逻辑到逻辑的一种纯形式主义的智力游戏,这与学术的本性是完全悖谬的。因此时代内容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学术关怀的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环境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外部对象和理论特色。辉煌于抗战时期的“战时新闻学”作为当时“学术救国”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兴起不仅是缘于时局的紧张,更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回应。

一、民族危机催生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焦虑

20世纪30年代是中日民族矛盾由紧张走向激化的年代。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占领了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多万东北同胞从此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深渊之中。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企图造成把东北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既定事实。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受到了严重的侵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动,以国共两党阶级矛盾为主的国内矛盾不再“一家独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进入国人的视线,民族解放斗争也由此开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力避冲突”,不要抵抗。事变发生四天后的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了国民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他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②。国民党的“不抵抗”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划了华北五省的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② 《民国日报》(上海)1931年9月23日,转引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谓“自治运动”，取得了对华北五省实际的控制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都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①。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危机的呼声一时间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呼吁国难危机最早的是新闻界。“九一八”事变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根据局势的发展，发表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中日战事的社评，给国人指出了严重的“国难”危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三天他发表了《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的社评。此后连续发表了《愿日本国民反省》、《望军政各方大觉悟》、《民国二十年国庆辞》、《马占山之教忠》、《国家真到严重关头》、《救东三省僻伪独立》等文章抗议日军侵占我国东北的暴行，并历数过去日本侵华的种种劣迹，指出“外患侵入，固早如点滴漏浸，愈久愈深”^②。北平《世界日报》在9月20日的要闻版以《国难至矣，速起御侮！日军昨陷沈阳！》为标题，整版报道日军的侵略罪行。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把解决事件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然而日本拒绝了国联要求其11月6日前撤兵的决议，国民政府的希望成了泡影。为此张季鸾于11月22日发表了《国家真到严重关头》的著名社评，指出“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三省”，“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③。

饱含民族忧患意识的知识界，对日益严重的国难危机也有着切肤之痛。傅斯年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发表文章认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机，也正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④傅斯年将“九一八”事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足见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

② 张季鸾：《季鸾文存》（上），《民国丛书》第一编（98）综合类，上海书店，1989年，第47页。

③ 张季鸾：《季鸾文存》（上），《民国丛书》第一编（98）综合类，上海书店，1989年，第61页。

④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九一八”日本的入侵对于知识界的巨大触动^①。“九一八”事变及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给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以极大的刺激,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读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②胡适在国难危机的当下心境也难以平抚,他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有这么一段话:“大火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救国’等等工作,眼看就要被毁灭了。”胡适的这段话透露出当时怀揣着各种救国梦想的分子对国难危机的焦躁与不安,很能概括“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的国难当头的心境。

二、思想界学术界吹响民族救亡的主旋律

国难危机和民族救亡是相辅而行的,正是严重的国难危机激发了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抵抗意识。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抗日救亡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众多社会民主人士,纷纷发表言论,要求抗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知名人士马相伯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一文,要求国内各党派各集团“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也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了“两大救亡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顾颉刚回忆起“九一八”事变时曾说:“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③国联令日本从中国撤兵失败后,胡愈之认为中国只有“大无畏地向前斗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方才能找出一条活路^④”。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顾颉刚、冯友兰、梁士纯等联合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104名教授于1936年10月13日联合署名发表了著名的《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指出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全民抵抗刻不容缓,全文如下:

① 王造时:《救亡两大政策》,《荒谬集》,《民国丛书》第二编(100)综合类,上海书店,1990年,第20页。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7页。

③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2页。

④ 胡愈之:《现代的危机》,《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1932年1月1日。

国民政府，行府院军事委员会钧鉴，全国各报馆，各通讯社，各杂志社，各机关，各法团暨全国人民公鉴：

溯自沈阳之变，迄今五载，同人等托迹危城，含垢忍泪，不知其运命之所届。去秋以来，情事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绥北危急，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辞，增援一卒，大擢全国领土，无在不可断送于日人一声威吓之中。近来对日进行交涉，我政府所受之威胁虽尚未宣布，然据外电本诸东报所传，谓日本对中国有以下诸条款之提出：（一）华北五省独立；（二）经济合作，减低对日关税；（三）完全消灭抗日运动；（四）开除与抗日有关之领袖；（五）中日合作防共。除抗日运动，激发之力属于彼方，非我所能主动之外，其他条款，姑勿论所传之虚实如何，任承其一，即是以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深渊，堕“中国之自由平等”之追求于绝路，中山先生所遗托于吾人之重任，数十年先烈所糜躯洒血以殉者亦将永绝成功之望。我全国人民，至于今日，深知非信仰政府不足以御外侮，精诚团结，正在此时，深不愿我政府轻弃其对国民“最后关头”之诺言，而自失其存在之领导地位。故为民族解放前途计，我政府固有根本拒绝此诸条款之责任，而为国家政权安定计，我政府亦当下根本拒绝此诸条款之决心。在昔绍兴之世，宋虽不竟，犹有顺昌之撷；端平之世，宋更陵夷，复有淮西之拒；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时或沦于不才不肖，从未有尽举祖国之貽，国命所系，广土众民，甘作敌屣之弃者。此有史以来所未前闻之奇耻大辱，万不能创见于今日。是则同人等覩民意之趋向，本良心之促迫，所敢为我政府直言正告者也。同人等以国防前线国民之立场，在此中日交涉紧张之际，为愿政府明察华北之真正民意与树立救亡之目标起见，特提出下列数项要求，望政府体念其爱国之赤诚，坚决进行，以孚民望而定国是，不胜企禱之至。

一、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

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

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情事；

- 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
- 五、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
- 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
- 七、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
- 八、政府即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①

作为民主人士代言人的邹韬奋及其主持的《生活》周刊，在“九一八”事变后，也与时俱进地调整了办刊方针：“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故所有论述，多以当前事实为对象。”^②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生活》周刊主动改变了以提倡个人修养和职业道德为基本内容的办刊旨趣，大量的刊载有关抗日的新闻和时事政治材料，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正如他本人所言，该刊自“‘九一八’事变后，对于民族解放的倡导及不抵抗主义的严厉攻击尤不遗余力”^③。戈公振为报道“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不顾个人安危随国联调查团进入东北进行调查采访，为此他写了许多的通讯报道，一面讴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一面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告诫人们：“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④1932年胡愈之接任《东方杂志》主编后，也将其办成了宣扬抗日救亡、创造民族新生的舆论阵地^⑤。面对外敌的入侵，著名的大公报人张季鸾力主坚决抗战。1932年3月日军在东北炮制了“满洲国”，5月日本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默认了日军占领热河的“合法性”。对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中国、分割中国的做法，张季鸾发表了《中国岂堪被人零割》表示抗议，“吾侪决反对日本此种态度做法到底，

① 《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25日。

② 《我们最近思想和态度》，《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1932年1月9日。

③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韬奋全集》卷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7页。

④ 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转引自《新闻界人物》（1），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⑤ 张新华：《拓展言论空间传播进步文化——胡愈之的办刊艺术之一》，《中国出版》2001年第10期。